

历史的回望

寿永明 刘家思◎主编

LISHI
DE
HUIWA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历史的回望

LISHI DE HUIWANG

寿永明 刘家思◎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回望/寿永明,刘家思主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96-4187-4

I. ①历… II. ①寿… ②刘…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2940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秦 雯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5714687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20.25 字数:380千字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已经众所周知。作为鲁迅故乡的高等院校,绍兴文理学院研究鲁迅,不仅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年来,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确立了以鲁迅为龙头的绍兴籍现代著名作家研究为特色的学科建设战略规划,以提升学科内涵,增强为地方服务的社会功能,如今已经产生了初步成效。为了检视我们的建设情况,特地编选了这本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论文集《历史的回望》。

这实际上是一项试着去摸自己的家底,盘点自己的学术资产,审视今后事业发展路向的工作。

应该说,绍兴文理学院作为一所年轻的本科院校,其鲁迅研究延承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以来的学术传统。当时,在陈祖楠校长等领导的倡行下,陈越、顾琅川、吴国群、谢德铤等一批知名学者,筚路蓝缕,奋力开拓,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批学者,生于绍兴,长于绍兴,耳濡目染着越文化,最懂得越文化与鲁迅文化性格、主体心理以及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他们的研究以鲁迅与越文化为中心视点,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多方面的研究,从而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开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学术之路。学校升为本科以后,他们仍然潜心研究,不懈耕耘,坚守着这一块学术圣地。而且,为了事业发展后继有人,他们协助学校,内扶外引,培植提携,为绍兴文理学院,甚至是整个绍兴的鲁迅研究拓园配景,使鲁迅研究的学术传统得到不断延承,使鲁迅研究这块学术花苑保持着绚丽的景色。

正是这样,鲁迅研究在本世纪开初几年实现了学术接力棒的自然交接。在校长助理寿永明的倡行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在老一批学者的关爱之下,王晓初、陈浩、邹贤尧、吕晓英、王黎君、朱文斌、沈刚和刘家思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就鲁迅研究而言,这些学者应该说都是半路出家的,原先都有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方向,但为了延续鲁迅研究这一学术传统,他们一方面坚守自己原有的学术阵地,一方面又在鲁迅研究领域奋力前行。这不仅使我们的鲁迅研究保持了发展,而且繁荣了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拓宽了学术视野。尤其喜人的是,他们的鲁迅研究不是静态地守望着学校曾经开辟了疆土,

而是以各自原有的学术优势去深挖和拓展着,显示了一定的活力与生机。总体说来,这一批年轻学者的研究,是从越文化与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去纵横拓展的。这既得益于深厚的越文化土壤,又得益于原有学术方向的学科知识结构的自然嫁接。这种状况,既显示了学术上的传承性,也表现了它的发展性。

然而,我们选编这个文集,除了要明了自己的一些收获之外,主要是要摸一摸我们存在的不足,让同志们从这里发现问题,找出路径,寻求新的突破口。

自然,从越文化视角去研究鲁迅是我们的优势,这是我们要坚持的一个方面。然而,从越文化视角去研究的路径,今后如何走是值得深思的。越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精神流脉是大同小异的,是高雅的精英层级的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的精英形态是基本一致的。这不像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其文化形态与精神有明显差异。越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越往深挖,就会越强,那么越文化自身的内涵可能就逐渐稀薄。正是这样,我们在不断打造自己的优势的同时,也逐渐显示了自己的局限性。可见,前行之路是宽敞而又逼仄的。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是继续走已经开出的高速路,还是自己从渐隐渐显的羊肠小道中跋涉前进,恐怕是摆在面前的重要问题。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尽管追根溯源是大同的,但越文化毕竟因其地域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独特性。这正是我们可挖掘的空间与深度所在,也许在某些方面还是会有所作为的。不过,我们必须清楚,这种挖掘必须不断注入新的介质,方可有大的收获,不是可以无止境地扩大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都将视野集中于越文化,甚至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本位。我们必须要有新视点的介入,也要有新的学科的介入。要想取得大突破,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视角和方法。在这一点上,正如钱理群先生在《重新体认鲁迅的源泉性价值》一文中所说:“鲁迅研究的新开始,要求向‘博’与‘通’的方向发展,即要深入到更广博的领域,进行贯通式的研究与把握。这就要求新的知识结构、新的感悟力和新的想象力。”他在此文中还预言:“对鲁迅研究的突破,可能不是来自鲁迅研究内部,而是具有其他学科的学养而又深知鲁迅的学者。”这对于我们的鲁迅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凉的论断,然而却是充满期待与学理性的警策之论,他从宏观上给我们今后的鲁迅研究指明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和一条隐藏着希望与可能的路径。鲁迅研究必须树立开放的意识 and 从容的心态,绝对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以此作为人生通达的阶梯而封闭自守,更不能从私人欲望出发走什么“捷径”,尤其不能妄自抢滩而自踞。如果那样,不仅我们自己的鲁迅研究事业会做不大,而且对鲁迅这个研究对象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当然,我们不能消极等待,而应该积极努力,不断攀登。不管任何时候,要研究鲁迅,

首先必须熟悉鲁迅。这体现在常识性的两方面：一是对于鲁迅的思想精神世界要有全面的理解和独到的认识，其捷径自然是从鲁迅创造的文本世界中去把握；二是对于鲁迅研究的学术史要有全面的把握，要以犀利的眼光去发现，用敏锐的思维去思辨。当然，后者应该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如果能够深入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全面把握鲁迅个体与社会群体历史演进的复杂关联性，拨开惯性套路与世俗观念的思想阴霾，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切入点，独立地建构起自己的科学的阐释体系，那么我们的鲁迅研究迎来新的突破，恐怕路途就不远了。自然，对我来说，这是望尘莫及的，我只能寄希望于学科同仁，当然也寄希望于全国鲁研界的专家们。

我们编选这个文集，要感谢大家的密切配合与大力支持。尤其要感谢的是陈越、吴国群、顾琅川和王晓初等先生。他们推荐了许多精彩的华章供我们选择，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使我深受感动。但由于经费问题，篇幅有限，大部分没有收录，我们在致以诚挚的谢意的时候，还要恳请他们谅解。在编选中，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们是一个群体，以整体面貌出现。由于时间跨度大，人员有所变动，因此选编时以文章的著作权为绍兴师专和绍兴文理学院为准，引进之前的或调离之后的都不在编选范围之内。同时，我们编选时适度考虑了文章本身的质量，但更重要的是考虑了如何归类的问题，所以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因不好归类而没有入选，自然这是很遗憾的。而且，鲁迅研究中的史料研究，也应该是我们以往的一大特色，但考虑到文体与篇幅问题而没有选编。所有这些，都是必须说明的。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还有一些先生的佳作没有选录进来，自然是我们要深表歉意的。这里还要加以说明的有两点：一是最后一组文章有的可以并列到第一组中去，有的可以归并到第四组中去，但这里考虑到研究方法上不同，有一定启示意义，有意单列；二是文章的注释问题。因历史原因，早先的文章发表时，注释不规范、不全面，后来期刊编辑走向规范，对于注释的标注也更加规范。为了尊重历史，此次编选，力求按原有形态编辑。这是我们要向读者致歉的。

因此，这本论文集虽然大体上能够反映我们的历史状况，也预设了我们的想象与希望，但它并不全面，遗珠之憾已经客观存在。但是我想，有了遗憾，就为后来者预留了空间，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我深深地盼望着。

刘家思执笔于风雅苑

2012年4月30日

目 录

前言	(001)
----------	-------

一

剑与书: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	陈 越(001)
摆脱陈源的阴影	
——也谈鲁迅与“绍兴师爷”	陈 越(012)
试论鲁迅的文化性格及其越文化印痕	陈 越(021)
“沉默的鲁迅”及其意义	
——从越文化视野透视	王晓初(031)
绍兴目连戏原型与鲁迅的主体意识	刘家思(042)
风景之发现	
——论越文化对鲁迅的负面影响	朱文斌(053)

二

论鲁迅思想与艺术的越文化渊源	王晓初(059)
论绍兴目连戏对鲁迅艺术审美的影响	刘家思(069)
鲁迅黑暗意象的发生学解释	
——1~18岁居住空间对鲁迅视觉图像的影响	沈 刚(082)
浙东学术、师爷气与鲁迅	
——论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之一	王晓初(091)
思想对话的形象	
——从绍兴民间文化解读鲁迅的思想风格	陈 浩(101)
鲁迅杂文风格形成论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论	王黎君(109)

三

经济叙事与鲁迅小说的文本建构	寿永明 邹贤尧(120)
弃医从文:鲁迅的言说策略	吕晓英(129)
试论鲁迅小说风格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吴国群(139)
鲁迅小说的先锋性	邹贤尧(148)
论鲁迅小说创作的走向	陈 越(156)
鲁迅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的比较观	吴国群(162)
鲁迅小说的方言运用	陈祖楠(174)
对鲁迅现代题材小说创作中断原因的思考	陈 越(184)

四

传统叙事手法的创造性借鉴

——《呐喊》《彷徨》叙事谋略浅论	顾琅川(196)
打开《阿Q正传》的新窗口	
——论邹七嫂形象的审美功能	刘家思(206)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	
——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	王晓初(222)
“油滑”:《故事新编》的艺术方式与文体	
——从越文化视野透视	王晓初(235)
《补天》试论	顾琅川(259)
鲁迅新编历史小说《理水》浅析	谢德铤(269)

五

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与嵇康	顾琅川 顾红亚(280)
试论蔡元培与鲁迅“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	吴国群(290)
茅盾与鲁迅传统文化渊源与文化性格之异同	吴国群(302)
武侠背景中的复仇叙述	
——《铸剑》《鲜血梅花》比较论	王黎君(311)

剑与书：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

陈 越

一

当人们谈论鲁迅时，无论是论人还是论文常常会牵涉到他的籍贯，且或褒或贬，这在中国其他的现代作家中，是极为罕见的。例如，1902年，年轻的鲁迅远离故土，到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即有同学叹曰：“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①二十余年后，在“女师大事件”中，制造流言的陈源招架不了鲁迅的驳斥，乃借籍贯对鲁迅做人身攻击：“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

曹聚仁也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都是属于绍兴的，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而且肯定陈源的说法“着实抓到痒处”^②。不久，在“革命文学”口号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人又袭用此法，以至于鲁迅感叹：“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庭、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而这居然又引出“杜荃”的一番斥责：“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庭、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由此很滑稽地给鲁迅安上一顶高帽子“封建余孽”^③。又三十余年，毛泽东在1961年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特作七绝二首。其一是赞颂鲁迅“博大胆识铁石坚”，其二则是赞叹鲁迅故乡的优秀人文历史传统：“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律氤氲入诗囊。”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出发点，但在论及鲁迅时，却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他的地域文化背景。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越文化个性鲜明、引人注目；二是鲁迅与其所属的地域文化联系紧密，受到它深刻的影响。

地域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它确是一门很有价值和发展潜力的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尽管漫长的历史已逐渐模糊了当初曾经是精确的地理学意义，只剩下大致的地理范围，但这种模糊的地域概念已转化为文化界分的标志，深

① 沈颢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② 曹聚仁：《鲁迅评传》，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③ 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卷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深地积淀于人们的意识深处,人们无法忽视这个文化范畴的存在。

在当今的地域文化研究热中,越文化应该是值得人们加以关注的,它具有较之别的一些地域文化更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越文化历史久远,按照目前考古发现,源头至少可上溯到七千年前已具有海洋文明特征之河姆渡文化,较“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统说法,还早两千年。二是它虽历史久远而地域文化界分恒定,其中心地绍兴这一当年越国古都,历2000余年而城址不变,举世罕见。三是历史久远而永葆文化活力,因之六朝、唐、宋、明、清、民国,越地一向社会经济繁荣,时至今日,浙江经济之发达,仍为世人所瞩目。四是越文化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历代名士辈出,毛泽东因之称绍兴为“名士乡”。鲁迅,正是绍兴众多名士中一位杰出代表。我曾在拙著《鲁迅传论》中写道:“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垄断产生知名人物的专利权,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产生某些优秀人物,但像绍兴——越文化的中心地那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连绵不断地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而形成令人瞩目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这在别的地方确实是少见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有特殊的研究价值。鲁迅诞生在绍兴,有其一定的偶然性,比如,如果当年会稽覆盆桥周家第一世祖周逸斋不从湖南徙居来绍,那一切又当别论。但作为‘名士乡’的绍兴,孕育了鲁迅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则又有其必然性: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是鲁迅得以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鲁迅是从地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了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壮‘发育’的基础。”^①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诚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西方先进文化对他的影响;但越文化的优秀传统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的影响,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人们发现,在越人身上,特别是越地名士身上,确实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鲁迅当年曾说柔石有浙东“台州式的硬气”,“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这就是一种涉及地域文化背景的思考。鲁迅所云之“硬气”,或者说鲁迅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硬骨头”精神,正是越文化中颇引人注目的一种表征。越地历史上具有这种硬气的人物比比皆是,从“卧薪尝胆”之勾践起,魏晋时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终因“刚肠疾恶”而为司马昭所不容,临刑一曲《广陵散》之嵇康;有宣告“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最终拒绝与清合作,大书“不降”二字绝食而亡的王思任;同时还有被时人尊为“泰山北斗”之蕺山先生刘宗周,清军以礼相聘,刘书不启封,绝食二十三日而逝;散文名家祁彪佳,亦拒绝清之礼聘,留《别庙文》、《绝命词》,从容赴门前水池谢世。志书记载:“东方渐明,柳陌浅水中,露角巾寸许,端坐卒矣,犹怡然有笑容。”至于清末徐锡麟、秋瑾,当代马寅初等人之“硬气”,更为世人所知。

对此,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意义上存在着的地域文化,它理应以文化模式的方式

^① 陈越:《鲁迅传论》,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而存在。文化模式是特定的民族或特定的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方式。文化模式以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这种影响力持久而稳定,它往往能跨越时代,跨越政治经济体制而左右人的行为。它是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诚如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所指出:“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地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的结合在一起的行为,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会通过不可思议的形态转变,体现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①在我看来,源远流长的越文化,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文化模式,根据它的内在精神和对个体的规范力,可以把它描述为“剑·书”文化,这既是一种历时态的描述,显示越文化阶段性特征;也是一种共时态的概括,揭示越文化几千年积淀而形成的本质性底蕴。杨义先生在1991年写的《古越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鲁迅〈铸剑〉新解》一文中曾提道:“剑文化是古越文化的一大特色,堪与东晋衣冠南渡后的书文化并列为于越文化的千古二绝。假若要谈论鲁迅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是不可忽略古越文化这种剑书交替互补的奇观的。”^②我以为,这一看法实际上已涉及对越文化模式的把握,它对解读鲁迅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二

春秋期间,越国宝剑闻名于世。《越绝书》载:“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越王剑有铭文的很多,除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外,还有越王者旨於剑、越王旨姑剑、越王朱勾剑,这三个人分别是勾践的儿子、孙子、曾孙。自铸铭文的宝剑为镇国之宝,代表一朝君主、一个国家,是越国文化的重要标志。《汉书·地理志》有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好恶取舍,乱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把民众的行为和观念归因于地理环境和统治者好恶两种主要因素,是很有道理的。前者自不必说,后者在我看来实际上与马克思所说的相通:“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因之,《汉书·地理志》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越

① 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② 《杨义文存》(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

③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绝书》则说：“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剑，正是春秋战国时期越文化“尚勇”的象征，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但我认为，关于“剑文化”的内涵，还有一些可深入思考之处：

其一，春秋乱世，各国互相杀伐，崇武尚勇也非仅仅是越国。然而，越文化中的尚勇，还有其自身的特色。武术界有云：“一寸短，一寸险。”与其他当时常用的冷兵器相比，剑更适用于近身格斗。鉴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特点，越国在军事改革中完全以步兵取代了车战，这使搏杀特别惨烈，尤非“锐兵任死”者不可。越军有敢死队，甚至以“自刭”震慑对方而取胜，例如发生在公元前496年著名的吴越携李（今嘉兴）之战，越军的“锐兵任死”令人惊心动魄。由此可见，较之他人，越人之“尚勇”更显示其刚烈之特征，故被人视为“虎狼之师”。也因之使越人特别难以忍受屈辱，报仇雪耻成了越地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特征，鲁迅多次引用王思任语：“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国语·越语上》说：“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此语中值得注意的是越人的尚勇，非一般好勇斗狠，亦非“士为知己者死”，显示的是重大义，讲气节，这正可解释为什么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越地则多慷慨赴难之士。鲁迅《铸剑》中的“宴之敖者”，当非“游侠”之辈，作者在这不无自况的人物的描写中，正有意无意地提示了越人剑文化中“尚勇”的本质特性，也显示了受制于这一文化模式中的鲁迅这一个体的文化个性。鲁迅之主张“报复”，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诚如他所言：“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其二，武术界又云：“剑走轻灵。”使剑不靠蛮力，讲究敏捷机灵。《吴越春秋》记载：有越女，生长于会稽山南野林中，精于剑术。勾践使使聘之，道遇袁公试剑，袁公不敌，变白猿而去。勾践问以剑道，越女答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幽而深……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剑道，其实造就了越人的文化性格：虽尚勇，却非蛮勇，而是“幽而深”。这种刚柔相济，正是“剑”的品性：柔可绕指，其锋则可削铁。勾践战败，亦曾“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但终于忍辱求和，以屈求伸。夫差不识越人之“幽而深”，结果付出亡国的代价。历史上的越人斗勇又斗智，凭的是一股“韧”劲，这其实是他们的先民在河姆渡文化之后，退居会稽山上刀耕火种三千余年，顽强地存活下来所积淀的一种民族性格。曾有人以鲁迅当年不带头上街游行，不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第一线，不发表宣言痛快淋漓地斥责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者为不然，这也是对“剑文化”认识的不足。“剑文化”是奠定鲁迅“硬”和“韧”的文化性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鲁迅的精神世界深处，似乎正存在一种“剑”的情结。早年，鲁迅自号“戛剑生”；北京时期，他极赏识同乡画家陶元庆所绘《大红袍》中女子倒悬着握剑的突兀姿势；广州时期则作历史小说《铸剑》。“剑文化”事实上制约规范着身为越人的鲁迅，成为鲁迅生存的深层维度。鲁迅仅是个案，在越人，特别是越地许多名士身上，确实都表现出“剑文化”所蕴涵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如上文提到的王思任等诸多越地先

贤。也因此,对陆游“少携一剑行天下”、秋瑾的“夜夜龙泉壁上鸣”,这类越中先贤诗文中常出现的“剑”的意象,联系他(她)们实际的行为方式,也不会单纯地看做是好说“书剑”之一般文人习气。

三

关于文化模式,我们除了应当探究它的基本作用和功能,即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以及对于人的活动、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一般制约作用以外,还应当关注文化模式的演进机制。文化模式在较大的历史尺度上会发生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从更高的层面上制约、影响和规范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关于这一点,以前我们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似乎还关注得不够,较多地对某种地域文化的特性和内涵作凝固的考察,少一种动态过程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欠缺“史”的意识。

事实上,和具体的文明成果相比,作为人的本质性生存模式的文化,其变化相对缓慢,但它们也会发生变化,而且是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巨变,这就是文化的转型。这种文化巨变,正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步。在较大的历史尺度上的每一个文明时期,总会有一些本质性的文化精神特征,代表着这一时期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发展程度,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模式,而各个较大的文明时代的文化模式所构成的历史系列,就从总体上展示出人类的进步历程,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都必然地、同步地经历着这些文化模式的嬗变。就地域文化的研究而言,正由于各个地域文化模式演变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各个地域文化相互间的冲突、交融乃至千姿百态的局面,也因之集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对于历史特别久远,而又始终保持着文化个性和活力的越文化而言,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不特别关注于它的文化演进机制。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越从此散,诸族子争王。公元前222年,秦统一六国后派大将王翦攻下江南,降越君,越遂灭。因政治、军事等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从战国时代进入了中国大一统时代,“剑文化”不能不面临一个失范问题,即特定文化模式的规范作用从常规期转入紊乱期。越文化最终顺应历史演变,终止了失范趋向,并在变迁中获得新的文化特质,这与东晋时北方文化大规模南迁有密切关系。这一次南迁,从东晋至南朝,持续时间约三百年。越文化此前从未受过如此大的异地文化洗礼,使此后的越文化与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文野之分,从此越地文风大盛,光芒四射。我们可以王羲之的书法作为象征,把东晋以后的越文化名之曰“书文化”,它在“剑文化”的刚烈的底蕴上,又添浓厚的人文内涵,越文化自此从“尚武”开始向“崇文”转型,这对越地的进步和发展影响甚为深刻。而宋室南渡,规模更大,数以百万计的北人南迁,使南方人丁兴旺,百业繁荣。南宋王朝还一度以绍兴为临时首都。正是在从东晋“衣冠南渡”到南宋“宋室南渡”这一较大的历史

尺度中,越文化最终完成了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文化转型。此种文化转型,促使越地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显性层面上看,一是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一改以前相对落后于中原之局面,而且自此之后始终领先于其他地域文化圈。二是文化艺术因之特别发达,人文荟萃,历代名士辈出,尤其是越文化的核心地绍兴,乃至有“名士乡”之谓。

因北方文化的南迁而促使越文化的转型,在我看来,也有几点是以前论者所忽略的而应该有深一层的思考的,其一是关于转型机制。虽然应该认定这种转型一方面是属于外在的批判性重建,外来的北方文化南移造成了对本土文化的冲击而出现原有文化模式的裂变,并最终形成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要素的整合而构成新的文化模式“书文化”;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因内源性文化危机而导致的内在创造性转化的原因。将“剑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勾践时期,但此后称强的也仅四代(或曰六代),由于周边国家齐、楚领土广,自然条件好,力量逐渐超过了越,而越连年征伐,国力空虚,宫内又内讧加剧,谋杀事件迭起,蕴涵着尚武、复仇的“剑文化”显然已趋向于失范。尽管我还无法列举文献典籍资料来证明当时生活在“剑文化”这一主导性文化模式下的越族已从自己内部产生出质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要素,但从越族此前的历史,我们了解越族具有非常善于顺应形势、调整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文化特性。史前时期,因第三次海侵,越人的大部从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河姆渡迁移至水土条件恶劣的会稽山上,历经三千年刀耕火种,顽强地生存下来。到第三次海退,又逐步地返归山会平原,重建家园,直至公元前468年,勾践由会稽迁都琅琊,称霸诸侯。所以,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转型,除了外因之外,也应有内在的超越性和自在性的矛盾冲突,以及自我完善的合理性要求方面的原因。其二,南北文化的交融应该说是互动的。“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才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及谢灵运的山水诗。谢安“东山再起”,使敌“草木皆兵”,所率八万之众,自当是吴越健儿为主。其三,还应细加分辨的是,“衣冠南渡”对吴越的影响,由北至南又略有程度深浅的不同。史载,当时南迁人数至少有七十万。一部分越过长江后,继续南进,到达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闽广,但落户今江苏的较多,其中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总数的一半以上。^① 相比而言,有钱塘江之隔,到今绍兴一带的北人则较少些,西晋贵族的奢侈和清谈之风因之对越地影响较小,未曾能动摇越地传统的刚烈和俭朴务实之风。“宋室南渡”情况亦是如此,北人大量迁居杭州,似是把整个的汴京一锅儿都端了过来,“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偏安之局,西湖成了“销金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这与以后“浙东”、“浙西”之明显的文化差异的形成有因果关系。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繁悦,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336页。

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越文化的中心地带浙东，在两次北方文化南移之中，受很大影响，但还保留着原有独特的文化底蕴。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转型，显然不是本土文化因异地文化的冲击而消亡，而是通过本地文化和异地文化的交融而达到文化上的一种超越。

东晋之后的“书文化”对越人的影响之深刻且深远，这应该是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历史事实。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其制约规范作用对鲁迅不可能没有影响，而且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对鲁迅而言，较之别的一些越地“名士”，似乎表现更加突出。众所周知，鲁迅对魏晋文章的倾心是引人注目的，例如对嵇康，鲁迅以十余年的心血，择定善本，多次校勘，整理出《嵇康集》，以致“中散善本，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①。徐小蛮认为：“鲁迅先生辑录古籍，经部和史部、子部的一部分，集部的大部分，大都是魏晋时代会稽人的著作或有关魏晋时会稽人的著作”，“鲁迅先生为自己选择了对他本身的研究来说是最佳的时间与空间，即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来辑录古籍。”^②这一坐标折射出鲁迅对自己所属的地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血缘亲情，促使鲁迅当年“归魂故书”，因之建构了他精神世界中的“地域文化场”。^③

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转型对越地的影响，在显性层面上上文已谈到，但更重要的是在隐性的层面上，在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伦理规范等方面。在这一问题的理解上，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值得细读的一篇文章。鲁迅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这是一个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自觉”实质上反映了当时一些文化精英身上的“人之自觉”，如余英时据钱穆文，就判定“文学之自觉乃本于东汉以来士大夫内心之自觉，而复与老庄思想至有渊源。”所以国内外颇有些学者把魏晋时代比拟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④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对魏晋文人之自觉有切实的分析，他先划分为“士之群体自觉”与“士之个体自觉”，后者余先生又分别从“外在之想象着眼”，“内心方面探求”——“究其思想情感、行为模式及人生理想诸端”。其内心自觉之表现，余先生主要概括为“避世思想”、“养生与艺术”、“山水怡情”、“文学与艺术”。在“文学与艺术”这一方面，余英时先生对东汉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特别是其中草书之兴盛，有非常中肯之论述：“东汉末叶以后士大夫之个体自觉既随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之发展而日趋成熟，而多数士大夫个人生活之悠闲，又使彼等能逐渐减淡其对政治之兴趣与大体之意识，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之享受，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

① 鲁迅：《嵇康集跋》，《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②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及其研究价值》，《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7期。

③ 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94页。

④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11页。

之美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性情之所在。亦因此故,草书始为时人所喜爱。盖草书之任意挥洒,不拘形迹,最与士大夫之人生观相合,亦最能具个性之发挥也。”^①余先生此说实在很有道理。即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言,多年来实在是因其书名太盛而多少转移了人们对文章所蕴涵的人文价值的关注,他对越地山水之倾情,以及因之对人生无常之感叹,着实代表了当时越地众多士人的普遍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周一良等先生有这么一个观点:六朝的政治中心在建康,但文化中心却在会稽。^②鲁迅对魏晋时代会稽人文章之倾心,或者如徐小蛮所描述的那样,他把自己置于这一坐标纵横轴之交点上,实际上反映了身为越人的鲁迅对“书文化”中“人的自觉”这一时代精神、价值取向的传承和追寻。我们在鲁迅思想核心“立人”和“书文化”的本质“人的自觉”之间,是否可以发现一种文化上的血缘关系?如鲁迅自己所说的“不失固有之血脉”。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诚然是基于他对“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的人的解放的历史的考察。鲁迅发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使人“渐悟人类之尊严”,“顿识个性之价值”,人的“自觉之精神”因之得以发扬。然而,我所疑惑的是,形成鲁迅这一重要的思想核心的是否仅仅是以上所述的外源性的文化资源?我们是否也应追寻其中的内源性的“固有之血脉”?我认为答案就应该在“书文化”之中。鲁迅的“呐喊”不早不迟爆发于他在“S会馆”中“归魂故书”的六年之后,我想这不是偶然的。

四

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转型,强化了越文化较之其他地域文化更明显的“张力”特征。

在历史上,有些地域文化的特征比较好概括,如燕赵之慷慨悲歌,楚湘之浪漫瑰丽,但越地则不然,难以一言以蔽之。在越地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不少看似矛盾的东西却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例如,在艺术领域,绍剧和越剧,这是两种具有不同审美特征的剧种,前者高亢激越,富于阳刚美,后者委婉缠绵,富于阴柔美,在地域并不宽广的绍兴,这两种剧种同时并存,同样为老百姓所喜爱。又如建筑,越地的民居,其色彩特征是乌瓦粉墙,黑白分明,强烈的色块反差如此和谐地组合在一起,与小桥流水映衬,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再如绍兴的山水景观,典型者如东湖、柯岩,也是审美上之两极组合:削壁巉岩插于一潭柔波之中。对此,明张岱在《琅嬛文集·越山五佚记》中说:“谁云鬼刻神镂,竟是残山剩水”,“山为人所残,残其所不得不残,而残复为山;水为人所剩,剩其所不得不剩,而剩还为水。”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

②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18—119页。

山水倔强，仍不失故我。”特别是越人的文化性格上，这种“两极组合”更显得特别：毋庸讳言，历史上绍兴人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并不佳，“小气”、“精明”、“世故”，特别是“绍兴师爷”更为人所诟病。然而，当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或在大大非面前，越地历史上重气节、轻生死、大义凛然、舍生取义者则颇不乏其人。

越文化的张力特征的形成原因，首先是在于它的地理的特殊性。越地南靠会稽山，北临钱塘湾，域内峰峦叠嶂又水网交错。鲁迅说他的故乡“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①，其弟周作人则说：“鄙人是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水的利害。”^②周氏二人所说的其实即是张岱“山水倔强”的意思了，二者似有刚柔之别，但“倔强”是它们的本质。其次是历史的机缘使然，几次大规模的北方文化南移，使原本地处东南隅显得质朴的地域文化融合了中原、齐鲁文化之文采，因之变得“文质彬彬”，刚柔相济。而至近代，因临东海而又得“西风东渐”之先。历史、地理的原因使越文化得到了其他地域文化少有的南北汇合，东西沟通的机遇，强化了它的张力特征。正是这种张力结构，越文化一方面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自我超越性而与时俱进，因此，它既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生成，又不是亘古不变，而是经历着不断自我完善进程的越人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

我们同样可以从越文化的生成及生存方式——文化模式的角度来观照鲁迅，由此理解鲁迅精神世界中的某种独特之处。鲁迅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是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复杂性就在于鲁迅的精神构成中存在着诸多矛盾的因素，甚至表现为某种悖论状态，学界对此有种种阐述。以前相当长的时期中，时代使然，学界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并且作此消彼长式的论证，从而表明鲁迅不断地与时俱进，其实，我们应该用“合二而一”的观点来看待鲁迅的精神结构，可能会更符合鲁迅的实际。我赞同汪晖的看法：“对立的思维逻辑并没有导致鲁迅尖锐的心理紧张，恰恰相反，由于鲁迅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他的理论思考的历史前提，因此，对思辨内容的实用或现实的理解，使得相异的思想观点在‘同一性’现实需要中获得缓解。”当然，汪晖也认为，“追究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俨然‘同一’的逻辑体系常常是劳而无功的，他们在不同的场合，甚至同一场合信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但是，他们纷然的理论见解背后又确实存在着某种思维方法和心理的‘同一性’：中国知识分子顽强的‘实用理性’和感时忧国的内在激情，梁启超如此，鲁迅更不例外。”^③严于解剖自己的鲁迅多次谈到自己思想中的矛盾，“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中了些庄周韩非的毒”，但细察鲁迅对此的心态，确也不见什么“尖锐

① 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7页。

② 周作人：《苦茶庵打油诗·后记》，《知堂诗杂抄》，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11页。

③ 汪晖：《反抗绝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